

◎中国元史研究会||编

元史论丛

第七辑



元史论丛

第七辑

中国元史研究会 编

本辑主编 邱树森
编辑 文恒益 王 英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9年·南昌

元史论丛

中国元史研究会 编

邱树森 主编

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西省南昌市老贡院 8 号 330003)

URL: <http://www.jxeph.com>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南昌市印刷一厂印刷

(南昌市福山巷 96 号 330003)

1999 年 4 月第 1 版 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本 13.25 印张 200 千字

ISBN 7-5392-3253-6/K·30 定价:28.00 元

赣教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 元朝科举与江南士大夫之延续 [台湾]萧启庆(1)
- 元代行省机构组织考述 李治安(20)
- 元代监狱制度研究 刘 晓(35)
- 元朝仁宗期的财政稳定措施及其意义 [韩国]李玠爽(46)
- 宋元时期的官署志 方 骏(54)
- 宋元战争与四川文化的变迁 陈世松(61)
- 宋元崖山之战与粤、港、澳 邱树森(72)
- 宋元时期徽州族谱研究 赵华富(79)
- 元代海外贸易的管理机构 高荣盛(87)
- 元代斡脱经营海外贸易的原因及影响 修晓波(97)
- 从元代贺氏家族的兴盛看两种文化之间的中介角色 吴海涛(105)
- 论元朝的江西地区 许怀林(111)
- 元代内迁畏吾儿族世家——廉氏家族考述 王梅堂(123)
- 元代的天妃崇拜 陈高华(137)
- 妈祖信仰与元代漕运 [澳门]刘月莲(144)
- 俞本《纪事录》与元末史料 [香港]陈学霖(154)
- 从内蒙古地区的石雕像和壁画看元代社会生活 叶新民(173)
- 蒙古汗国父权封建制的特点及其前继后续 白拉都格其 薄音湖(180)
- 马可波罗与长老约翰——附论伍德博士的看法 杨志玖(186)
- 元代意大利和中国的文化关系 [意大利]比罗·科拉蒂尼著 屈文军译(191)
- 唐至元末苏丹与中国的关系 [苏丹]加法尔著 屈文军译(197)

Content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iterati and Officialdom in the Yangtze Delta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Xiao Qiqing(Taiwan)	(1)
Textual Research on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of Provinces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Li Zhi'an	(20)
Research on Prison Systems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Liu Xiao	(35)
Measures of Stabilizing Finance in the Regime of Renzong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and their Significance	Li Jieshi(South Korea)	(46)
Annals of Government Apparatus during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Fang Jun(Hong Kong)	(54)
The Song - Yuan War and Vicissitudes of Sichuan Culture	Chen Shisong	(61)
The Yashan Campaign and its Influences to Canton, Hong Kong and Macao	Qiu Shusen	(72)
Research on Clan Pedigrees in Huizhou during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Zhao Huafu	(79)
Administrative Organs of Foreign Trade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Gao Rongsheng	(87)
Cause of Ortoq Engaging in Foreign Trade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and its Influences	Xiu Xiaobo	(97)
Research on the Intermediary between Two Cultures from Analysis of the Prosperity of the He Family	Wu Haitao	(105)
The Jiang Xi Region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Xu HuaiLin	(111)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Lian Family, an Aristocratic Uighur Family Immigrating into Mid China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Wang Meitang	(123)
Worship of Tianfei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Chen Gaohua	(137)
Religious Belief of Mazhu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Dynasty's External Relations	Liu Yuelian(Macao)	(144)
Chronicles Revised by Yu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at the End of the Yuan Dynasty	Chen Xuelin(Hong Kong)	(154)
Analysis of Social Life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Based on the Stone Statues and Frescoes in the Inner Mongolian Region	Ye Xinmin	(173)
Characteristics of Patriarchal Feudalism of the Khan Kingdom of Mongol and its Predecessor and Successor	Bailadugeqi Baoyinhu	(180)
Macao Polo and Priest John	Yang Zhijiu	(186)
Cultural Relations between Italy and China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Piero Corradini(Italy)	(191)
Relations between Sasan and China from the Tang Dynasty to the Yuan Dynasty	Gaafar K. Ahmed(Sudan)	(197)

(王东峰译)

元朝科举与江南士大夫之延续

萧启庆

一、 导 言

士大夫是崛起于两宋的一个社会阶层，取代南北朝以来的门阀贵族而主宰近世中国社会。近世型的士大夫具有读书人、官僚与地主（或商人）三位一体的性格。士大夫凭藉以儒家经典为中心的文化道德修养而取得政治权力与社会地位，而土地拥有则为其学术修养及权力地位的经济基础或为其结果。这种三位一体的性格使得士大夫阶层的主宰地位历久不衰^①。

士大夫阶层的崛起及延续与科举制度具有密切的关联。学者大多同意：士大夫阶层的形成主要乃因北宋扩大科举规模以延揽士人。但是对于科举制度与士大夫家族地位的关系，仍然不乏争议。早期学者多认为：科举乃是政府为扩大其社会基础而引入新血的有效工具，也是平民士人进入宦途的主要途径^②。近来研究者则多强调士大夫阶层的区域社会基础并认为：科第之士大夫多来自早具财势的“地方精英”（local elite）家族，科举不过是这些家族延伸其身分的工具，所起注入新血的作用不大^③。事实上，这两种说法并非完全抵牾，而是相互弥补。科第之士虽然多来自望族富室，但出身庶族小姓者亦不乏其人。而富室望族亦唯有通过科举方能成为“全国精英”（national elite）之一部分并因而进一步巩固其在地方之势力。

南宋时代江南士大夫阶层发展颇为迅速，不仅数目日增，而其性格亦经蜕变。这种蜕变可自两方面言之：第一，人数庞大：由于宋代江南经济空前繁荣，人口迅速增长，教育蓬勃发展以及科举利禄的莫大引诱^④，以致士人数目急剧增加，由参与科举人数可以看出。北宋初年参与科举人数每科不过二三万人。南宋虽仅拥有江南半壁，但在其季年参与乡试者每科多达40万人^⑤，约为江南成年男子之2.5%^⑥。南北宋进士录取之多寡亦反映出土大夫阶层之增长。北宋前后取士不过18000余人，而南宋半壁山河之中即有2万余人登进士第^⑦。除进士外，享有类似特权的特奏名、太学生、举人等亦属士大夫阶层，为数更为庞大。江南文化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如福建、两浙、赣北等地区士大夫尤为繁夥^⑧。第二，地方化：根据美国学者郝若贝（Robert Hartwell）及韩明士（Robert Hymes）的研究^⑨，南北宋士大夫阶层之发展取向互相歧异。北宋士大夫多谋峥嵘于全国政坛，而南宋士大夫由于科举及经济资源竞争日烈，则多汲汲于巩固其家族在本乡的基

础——经营田产、善结姻缘并积极扮演地方领袖的角色，同时亦培植子弟以求在科第与宦坛显露头角，并再藉其政治地位而巩固在乡里的社会与经济地位。这种植根乡里与进军全国政坛的双重策略使不少士大夫家族得以长保尊荣及势力，即是朝代鼎革，甚至统治民族的变易对其影响亦不甚大。

在近世士大夫发展史上，元朝的情形较为特殊。士大夫地位的主要基础原为儒家思想在国家意识形态中的正统地位以及政府用人选才系根据个人的“成就”（achievement）而非根据“出身”（ascription）。元朝并未尊崇儒家为国家指导思想，仅视之作为一种宗教，与释、道两教并列，儒学遂不再是政府取士的主要评准。蒙古用人最重“根脚”（即家世）^①。高官贵爵几乎全为几十个“大根脚家庭”所垄断^②。这种用人取士首重家世的体制与科学制度依据个人才学取士的方法可说南辕北辙，全不相同。而且蒙古人重视实际办事能力，不尚文学经术，主要自胥吏中擢用中下级官员^③，元朝早期因而未曾采行科举。延祐二年（1315）以前，科举在江南中断凡40年，而在汉地（指金朝旧境）更长达80年^④。科举停顿数十年中，士大夫遂丧失主要的人仕途径，与国家原有的重要连锁亦告切断。

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宋朝士大夫阶层及其明清时代继承者——绅士的论著已甚繁夥，考述元朝士大夫阶层变迁的著作尚不多见。而且过去有关士大夫阶层的研究，大多局限于一朝一代，甚难看到这一阶层的成分是否受到朝代变革的影响。而在极少数贯穿数代的区域精英研究之中，元朝往往受到忽略而一笔带过^⑤。以致在近世士大夫发展之研究上，元朝仍然是一环“失落的连锁”。

为弥补此一缺漏，笔者拟以元朝科举恢复后“南人”（元朝用语，指南宋旧境居民，包括江浙、江西、湖广三省及河南行省南部，四川、云南则不包括在内，与广义之“江南”相当）中之登科进士为主要对象，并进一步研析元朝科第之家与宋明宦宦、科第之家间的延续关系。笔者希望此一考述能够显示：经历宋元及元明两次鼎革，不少江南士大夫家族皆能浴火重生，脱颖于科场，维持其政治社会地位于不坠，而元朝的科第之家遂形成宋明二代江南精英阶层之桥梁。

二、元初江南士人的状况

为说明江南士大夫如何克服政治歧视及科举未行的双重危机而在科举恢复后得以重振，本节拟对宋亡后科举停顿期间江南士大夫之处境作一简单考述。

忽必烈灭宋，为求速胜，注重招抚，未曾广肆杀戮，江南所受破坏远小于汉地。平宋之后，元廷更力求保存原有社会秩序，有如蒙思明所说：“是当宋元鼎革之际，不仅平民地主阶级未被推残，即官僚地主阶级亦受保护，与金之女真地主多被摧毁者大不相侔矣”^⑥，因而士大夫之社会经济地位所受影响不大，而在区域社会体制中尤其如此。蒙元征服对士人影响最大方面则是后者传统仕途途径之丧失及其与国家关系之疏离。

由于科举中断数十年，整个士大夫阶层遂丧失传统仕进主要管道。江南士大夫尤其受到歧视，仕进特别困难，乃因“南人”在元朝四个法定族群中身分最为低下^⑦。江南士

人欲求出仕，机会最少。

蒙元伐宋时，采取招降政策，归降者皆保留官职^①。后又规定：南宋官吏可“赍告敕赴省换授”，甚为优待^②。至元十九年（1282），元廷派遣程钜夫（1249—1318）至江南访贤，荐用名士二十余人^③。但是，整体政治环境对南人极端不利，元廷对南人固然十分猜忌，而北人（广义，包括蒙古、色目及华北之汉人）对南人亦甚歧视，认为“新附人不识体例”，多方排挤。至元十五年（1278）即有诏淘汰江南冗官，并谕“翰林院及诸南儒今为宰相、宣慰及各路达鲁花赤（darughachi）佩虎符者具多谬滥，其议所以汰之者”^④。同年八月即下诏“追毁宋故官所受告身”^⑤。江南文人虞集（1272—1307）入朝为官，据其回忆说：大德（1297—1307）中，集始来京师，江左耆旧名家、故国衣冠之裔同仕于朝者则有永嘉郑公兄弟（滌孙、陶孙）、新安汪君汉卿、都昌曹君伯明与今翰林待制袁君伯长（桷，1266—1327）数人而已^⑥。可见成宗时代南宋旧家子弟供职元廷者不过三五文人，点缀升平而已。至于地方官员，不仅“北方州县并无南方人士”，即是江南地方官员亦多为北人^⑦。《至顺镇江志》显示：该路各级职官几乎全为蒙古、色目与汉人，唯有教职以南人为主，南人所受歧视至为明显^⑧。

南方士人人仕的艰难可由下列两种统计看出：第一，南人在官员总数中所占比例甚小。韩国学者周采赫根据《元史》、《蒙兀儿史记》、《新元史》中有传可稽者加以统计，各族官员人数及比率为^⑨：

表一：元朝官员种族比率

种族别	蒙古	色目	汉人	南人	未详	总计
人数	774	919	1362	350	14	3419
(N%)	(22.64)	(26.88)	(39.84)	(10.24)	(0.41)	(100)

据估计，元朝总户数中，蒙古、色目仅占3%，汉人占15%，而南人多达82%^⑩。但南人官员仅占官员总数之10.24%，与蒙古、色目相较，其人仕之难易不啻有天壤之别，即与汉人相比，相去亦远。第二，南宋进士人元后退隐者甚多。日本学者植松正分析南宋进士人元后之动向^⑪：现有史料中可稽之宋季进士151人中，国亡后退隐仕者84人（55.6%），出仕元朝者57人（37.8%），动向不明者10人。但出仕之57人中，22人仅担任学职，算不上做官。官职较高者不过留梦炎（1219—？）、方回（1227—1307）、臧梦解（？—1335）等寥寥数人。退隐诸人中，固有甚多胸怀故国，不仕异朝的“遗民”，但亦有不少不过是人仕无门而被迫退隐者。

元代江南士人家族大多列为“儒户”。儒户的身分决定了大多数士人的权利、义务以及生活取向。因此，欲了解江南士大夫的情况，必先对儒户制度略加说明^⑫。儒户是元代的一种“户计”，而户计是户役制度的一部分，也是国家支配人力、物力资源的一种制度^⑬。全国人户皆经检定为各种户计，为国家承担各种义务。

儒户之设置始于汉地，宋平后推广于江南。凡是旧宋“登科、发解、硕学、名卿士大夫”，根据地方摺报，皆可入籍为儒户。至元二十七年后即无变动。据笔者估计，江南人籍儒户约为10万户左右，占江南总户数的0.85%^⑭。大多数的南宋科第及学问之家皆已

网罗在内。但因江南儒户中亦有原非士人家冒入儒籍者，真正科第之家当有不少未能入籍为儒。整体而言，这类沧海遗珠的“无籍儒人”应该为数不多^④。江南儒户可视为南宋士大夫阶层的沿续。

儒户的权利与义务大体和僧道等宗教户计相当。正如僧道生活是以寺院为中心，儒户生活是以学校为中心，皆须隶属于某一书院或学校^⑤。义务方面，原则上每一儒户需有一名子弟在学，即是年长儒人，亦须于朔望陪拜、听讲或讲书^⑥。权利方面，儒户一方面享有类似奖学金性质的廪给，另一方面则可免除全户差发，可说权利大于义务。与军民匠站等户计相比，地位显然优越。即与明清绅士相较，经济上所受待遇亦不逊色。元代儒户并未沦入宋朝遗民所说“九儒十丐”之惨境。

元代儒户主要问题是仕进。科学恢复前，学术与政治失去传统的连锁。缺少根脚的江南儒士欲求人仕主要经由下列仕途：第一，充任胥吏：机会颇多，升迁却慢，而且在儒士看来，胥吏为“役子人”的“小人”因面不愿屈尊降志，出任吏职。第二，充任教职：元代地方学校教员皆由政府任命，职位不多，而儒人数目庞大，欲求一教职并非易事，加以教职品级甚低，虽可转任职事官，但最多仕至下级州县官便已达致仕之年。总之，与前代相比，元朝士人仕进的主要问题在于职位的“质”，而不在于机会的“量”。唐宋科学盛时，进士前程远大，科第之士构成统治精英的核心。而元朝儒士，无论由吏进或以儒进，多是位沉下僚。大多数儒士终身以社区学校为生活中心，其在统治精英阶层中之地位已由核心转移至边缘。

总之，在儒户制度下，儒士享有不少特权，而其唯一的义务是就学。儒户制度遂成为宋朝科第仕宦世家学家家风延续的保障。科学恢复后，南人进士出身儒户者比率甚大，由《元统元年进士录》的记载可以看出，《进士录》载有17名南人进士家庭所属户计类别。其中10多名出身儒户（58.82%），另7名则出身民户（41.18%）^⑦。可见江南士人虽受冷落，但儒户制度却为这些家族之家风的延续提供适当之环境。科举恢复后，不少南宋科第旧家因面得以重振雄风，跃登宦坛。

三、南人登第竞争之激烈

延祐元年（1314）科举的恢复，对儒士——尤其是为数庞大的江南士子——而言，有如久旱甘霖。科举复兴之意义在于传统仕进途径的恢复而使士人重入精英阶层的主流。按规定，一甲进士授从六品官，二甲授正七品，三甲则由正八品起官^⑧。比起蒙古、色目“大根脚”子弟动辄以上品入仕，虽然逊色不少，但与经由胥吏及儒学教官入仕者相较，进士出身优越不少。跃登进士便可不必埋首乡校或屈身胥吏面能在国家官僚体系主流中浮沉。

但是，对江南士人而言，元代科举并非入仕的康庄，而是极难挤人的窄门。按规定，乡试及廷试南人录取名额皆甚有限。乡试各国录取乡贡士300人，其中南人所占名额与蒙古、色目、汉人相等，仅75人，分布于江浙、江西、湖广三行省及河南行省南部宋朝旧境。廷试则自各族群按三中取一的原则，共录取进士百人，其中南人不过25人^⑨。而

且前后 16 次考试中,唯有元统元年(1333)取足百名之数。其他各科所取,多则 90 余人,少则 50 人。16 科合计共取 1139 人^⑧,平均每科仅录取名额相等的规定并未严格执行,南人录取名额可能较其他族群略多,但出入不致太大^⑨。每科平均录取南人进士不致超过 20 人。

与南宋相比,元朝南人欲登进士第远为困难,南宋疆域略大于元朝南人区域,但录取进士远多于元朝南人名额。就进士层次而言,南宋每科平均录取进士 450 人左右,相当于元朝南人录取平均数的 22.5 倍。就乡贡层次而言,元朝南人间之竞争亦远较南宋激烈。元朝江浙行省每科赴试者达 3000 人,角逐该省 38 个乡贡进士名额(3000 人中亦有蒙古、色目,其名额不在 28 名之内,但蒙古、色目考生甚少)^⑩。而江西行省每科亦有数千人参加乡试,竞争 22 个名额。两省乡试录取率皆是百不及一。与宋朝乡试“满二十人解一人,不满三十人解二人,三十人以上解三人”的配额相比,难易相去亦远。再由若干地区录取进士或乡贡之多寡亦可看出两代南人登第之难易。徽州在南宋共有 432 人登进士第^⑪,而在元朝仅有 5 人^⑫。抚州在两宋所产进士为 628 人^⑬,而在元朝不过 12 人^⑭。衢州在宋朝大中祥符(1008-1016)至宝祐(1253-1259)200 余年间,登进士第者 200 余人,在元朝前八科中乡举者不过 5 人,其中尚包括蒙古 1 人^⑮。元季明初学者徐一夔更就杭州路之贡额比较三代科举之难易:

杭为方州时,贡士之数自淳熙(1174-1189)至景定(1260-1264)增至二十二人。元置行省于浙,领郡三十二,杭隶焉,贡士之额仅二十八人,是时杭之士不加少也,三年或不能贡一人。今领郡九,杭亦隶焉,其额增至四十人矣!杭之士不加多,三年一贡有六至七人者矣。犹虑未足以进其材也,复比年一贡矣!^⑯

杭州为南宋旧都,亦为元朝人文荟萃的大都会,“三年或不能贡一人”,反映出元朝江南乡试竞争之激烈。由于竞争激烈,不少文人士子避难就易,“由江以南就试外省者多至八千余人”^⑰,换言之,江南士子远赴北方各省就试,以求在中举较易的汉人乡试中图一侥幸。当时,又有举子假蒙古、色目人之名参试^⑱,此种情形恐在汉人、南人中皆不乏其例。

在竞争极端激烈的情况下,久享儒户制度保护之南宋士大夫家族之子孙自然享有优势。甚多世家子孙皆赖科举的恢复而得重返政坛。

四、南人进士家庭背景分析

为研析南人进士家庭背景及其与南宋江南士大夫家族之关系,笔者乃制作“表二”及“表三”。两表的制作系根据仅存的两种元朝进士登科记——《元统元年(1333)进士录》及《辛卯(至正十一年,即西元 1233)会试题名记》^⑲以及笔者对其他 14 科登科进士的名单及家世资料所作的辑注^⑳。

表二及表三皆依时代分为三期对南人进士的家庭背景及祖先官职加以统计。“前期”系指自延祐二年(1315)首科至至顺元年(1330)16 年间 6 科而言。后期则指自至正二年(1342)至至正二十六年(1366)末科 25 年间 9 科而言^㉑。元统元年一科则独列,视

为中期。前期距宋较近，后期则入元已深，前后两期进士家庭在宋元两朝仕宦之情形自然不同，故将前后两期分列，有助于了解进士家庭与宋元二朝间关系的变化。至于元统元年一科，由于（进士录）所提供之进士名单及家庭背景甚为完整，不似其他各科资料系辑录而来以致缺漏甚多。将该科分列，有助于验证前后二期统计之正确性。

表二：南人进士家庭背景

	仕宦 (%)	布衣 (%)	合计 (%)	缺载	总计
前 期	40 (70. 18)	17 (29. 82)	57 (100)	58	115
元统元年	14 (58. 33)	10 (41. 67)	24 (100)	1	25
后 期	19 (70. 30)	8 (29. 63)	27 (100)	87	114
期未定	1 (25. 00)	3 (75. 00)	4 (100)	26	30
合 计	74 (66. 07)	38 (33. 93)	112 (100)	172	284

表二旨在显示进士家庭之仕宦与非仕宦背景。此表之制作系以家庭为单位。凡进士之曾祖、祖父、父亲之中有一人具有仕宦背景者，该家即列入“仕宦”，若无则列入“布衣”。此处所谓“仕宦”，乃采广义，包括宋元朝的官吏及科第之士在内。宋朝的科第之士包括享有仕宦或其他特权之进士、特奏名、举人及太学生。元朝的官吏则涵盖教职人员，乃因教职人员皆为官僚组织之一部分。因此，此处之“仕宦”包括宋元二代的统治附层及其边缘家庭。

表二显示：历科南人进士现仍知其姓名者共有 284 人，而家世可考者则为 112 人。在此 112 人中，三分之二（66. 07%）来自仕宦家庭，三分之一（33. 93%）则出身于布衣之家。前后二期“仕宦”与“布衣”之比率甚为相似，即“仕宦”家庭约占七成，而“布衣”家庭约占三成。与前后二期相比，元统元年进士出身仕宦家庭者的比率较低，出身平民家庭者比率较高，两者分别为六成弱（58. 33%）与四成强（41. 67%）。此一差异当系反映前后两期统计所根据的史料之缺陷。两期进士家庭背景缺乏记载而未列入统计者为数庞大（见表二缺载栏）。依常理推测，史料缺乏记载之家庭，布衣应多于仕宦。因此，前后二期进士出身于仕宦家庭者实际应少于七成，而元统元年的统计当较近实情。即使如此，大多数之进士仍系出身于宋元二朝的仕宦之家，而非官场新血。

与宋明两代进士相比，元朝南人进士新血之比率较少。柯睿哲（E. A. Kracke）对绍兴十七年（1148）及宝祐四年（1256）两种登科记录之研究显示：祖先三代无科第仕进纪录之南宋进士约占总数之六成弱^①。而何炳棣研究明清进士则指出明朝进士中，49.5%来自三代之间既无举人、进士，亦无高官的新血家庭^②。虽然本文及柯、何二氏对新血（或布衣）及仕宦家庭之定义颇有歧异，无法正确比较。但是，此一比较仍然反映：元朝南人进士出身仕宦家庭者比率较高，来自布衣背景者比率较低。

“表三”旨在进一步显示进士祖先三代在宋元两朝的实际仕宦状况。本表系以个别祖先为计算单元。284 名南人进士祖先 852 人中，仅有 282 人事迹可考。在此 282 人中，身为布衣者占有 52.77%，在宋朝曾登科第者占 20.57%，未曾登第而任宋朝官职者亦占 13.12%，两者合计高达 33.69%。而在元朝担任一般官职者占 8.51%，曾任教职者占 6.03%。两者合计不过总数之 14.54%。可见具有宋朝仕历之祖先远多于曾在元朝有缘出

仕者。

表三：南人进士祖先职位分析

	宋 职		元 职			合计(%)	缺载	总计
	科第(%)	官职(%)	官职(%)	教职(%)	布衣(%)			
前 期	36(24.32)	26(17.57)	5(3.38)	10(6.76)	71(47.97)	148(100)	197	345
元统元年	12(18.18)	8(12.12)	2(3.03)	4(5.33)	40(60.61)	66(100)	9	75
后 期	10(16.13)	3(4.84)	16(25.81)	3(4.83)	30(48.39)	62(100)	280	342
期未定	0(0.00)	0(0.00)	1(16.67)	0(0.00)	5(83.33)	6(100)	84	90
合 计	58(20.57)	37(13.12)	24(8.51)	17(6.03)	146(51.77)	282(100)	570	852

若按时期分析，则可看出进士祖先仕宋者逐期减少，而仕元者日增的趋势。一方面，前期进士祖先在宋朝登第（24.32%）及任官（17.57%）比率甚高，合计达41.89%。而在后期，两者合计则不过20.97%。元统元年进士祖先的比率与此一递减之趋势亦颇吻合。另一方面，前期进士祖先在元朝担任一般官职（3.38%）及教职者（6.67%）合计不过为总数的10.14%，元统元年进士祖先曾任元职者所占比率为8.36%，与前期相似。后期进士祖先曾任元朝官职及教职者则有大幅度增长，两者合计达总数的30.64%。但其中任教职之比率（4.83%）与前期相较，出入不大。担任一般官职者之比率（25.81%）则增长极大。至于祖先在宋元两朝皆未出仕而身为布衣者之比率，前期（48.65%）仅略多于后期（48.39%），甚为相似。而元统元年进士祖先身为布衣者则高出前后两期10%以上。此一差异似亦反映史料之完备与否，元统元年之史料甚为完备，该科进士祖先身为布衣之比率可能最近实情。

五、南人进士与南宋世家之关系

本节拟以实例展示甚多南人进士皆系出身于宋朝仕宦世家或平民书香。

出身南宋名门宦族的南人进士确实不少。其中有宗室，有圣裔，有前朝王室后裔，有宰相子孙，亦有科第世家之裔。

出身宋朝宗室者有泰定四年（1327）进士赵宜浩。宜浩为宋太祖子德昭十三世孙，曾祖与濬主管神佑观^⑤。宋时宗室享有较高政治社会地位，以致在学术、文艺方面人才辈出^⑥。

出于孔门南宗者则有至正二年（1342）进士孔暘（1304-1382）及至正八年（1348）进士孔克表。自孔子四十八代孙孔端友随宋高宗南迁，在衢州建立家庙，南宗遂告成立，南宗在宋仕宦甚盛。元朝平宋后，南北宗复归于一。南宗失去爵位，族人难人仕途，却产生几位进士^⑦。孔暘之曾祖景行为宋朝进士，官礼兵部架阁^⑧。孔克表则为孔子五十五世孙^⑨，家衢州，亦系南宗子弟，却自东平乡举而成进士，应划为汉人，表二及表三未列

人计算^⑧。

出于前朝王室者则有至正十一年(1351)进士钱宰(1299-1396)。钱宰为五代时期吴越武肃王钱鏐(852-923)十四世孙。钱氏“自纳士归宋,子孙殍有禄位,出入词林,以文承家”^⑨。不过钱氏各支地位不尽相同^⑩,钱宰出于何支已不可考。

宋朝宰执名臣子孙登元代进士第者有延祐五年(1318)科虞槃(1274-1327)及泰定元年(1324)科史炯孙。虞槃为乾道左丞相虞允文(1110-1174)之五世孙,曾祖刚简(1164-1227),官至利州路提点刑狱^⑪。虞氏原籍四川仁寿,后徙于江西崇仁,是宋元之际兵燹之中东徙四川世家之一^⑫。槃兄集(1272-1348)为元朝中期之文坛祭酒。史炯孙则出身于南宋最为显赫的科第仕宦世家——四明史氏^⑬。曾祖弥鞏为权相史弥远(1164-1233)之从弟,史嵩之(?-1257)之叔,嘉定十年(1217)进士,累官江东提点刑狱。祖有之为宝祐元年(1253)进士,官阶朝散大夫^⑭。

出身宋朝官宦家庭者尚有延祐二年科张士元(1269-1329)、黄潛、延祐五年科汪泽民(1273-1355)、至顺元年(1330)科方道叟、李裕(1294-1338)及元统元年科之宇文公谅(1292-?)。张士元之高祖张泽为宋隆兴元年(1163)进士,官至兵部尚书^⑮。黄潛曾祖梦炎为淳祐十年(1193)进士,官至行太常丞^⑯。汪泽民为南宋初名臣显谟阁学士汪藻(1079-1154)七世从孙。泽民家居宣城,但出于婺源汪氏,婺源汪氏在南宋科第极盛,先后有19人登进士第^⑰。泽民伯高祖鸿举、祖梦雷、伯父鼎亨皆中进士,“奕世科名,蝉联不绝”。其中梦雷官至知靖州^⑱。方道叟出于淳安科第理学世家,曾祖逢辰(1221-1291)为咸淳十年(1274)状元,官至吏、礼部尚书,学者尊为蛟峰先生^⑲。李裕之祖大同为朱熹弟子,嘉定十六年(1223)进士,官至宝谟阁学士、知平江府。曾祖自立登淳祐元年(1241)进士第,累官知庆元府事^⑳。宇文公谅家居湖州,却是出身于成都名族,“以诗书为世业”,历代皆有显宦。公谅之曾祖嗣,累官知嘉定府。祖大钧为知万州,父挺祖则于宋季任平阳县尉^㉑。

此外不少进士家庭在宋朝虽无显宦,却是典型的科第世家。兹以莆田方氏、林氏及眉山刘氏为例,加以说明。

至正十一年科方德至及二十六年科方景章皆出身莆田兴化方氏。方、林二氏为莆田最为成功的科第仕宦名族。方氏在两宋先后登进士第者多达83人,有如清朝学者李清馥所说:“方氏家学,自宋初至季世,儒学功名,指不胜屈”^㉒。德至高祖大东(1185-1236)为端平二年(1235)进士,摄瓯宁府学教授。曾祖澄孙(1214-1261),登淳祐七年(1247)第,官至秘书郎。祖公权,则为咸淳七年(1271)进士,累仕太常主簿。总之,方氏祖先三代皆登科第^㉓。

延祐五年进士林冈孙及至治元年(1321)林以顺皆出身莆田林氏。冈孙之曾祖得之、祖应成、父栋皆进士。应成及栋分别官至宣抚机宜及同安知县^㉔。以顺则为应成之孙,冈孙之从兄。其父栖、兄以辨皆不事科举而究心于程朱之学^㉕。可见林氏为科第理学世家。

延祐二年刘彭寿(1273-1336)则出身眉山刘氏。其家为另一东迁的四川世家,居于衡山。“世明春秋,自曾祖演至于侣(彭寿之子),五世一经相传。科第接武,多著述”^㉖。彭寿之祖演得开禧三年(1207)乡解,祖蕃卿为淳祐七年(1247)进士,摄卯州

同知，父渊三领乡荐，以春秋冠全蜀，而彭寿之子倡（？-1335）则为元湖广乡贡进士。可见刘氏科业经历五世，贯越二朝。

进士祖先具有宋朝科第及仕宦背景的比率以前期为最高，然后逐期递减。此一现象乃决定于代次的变化，甚为自然。前期各科上距宋亡约四、五十年。进士之曾祖、祖父二辈活跃期皆在宋朝，父亲一辈，亦有不少在宋朝已经登科或入仕。元统元年科上距宋亡已50余年，该科进士曾祖于宋亡时多已过盛年，祖父一辈之活跃期则在鼎革前后，在宋朝登第或任官者为数不少。父亲一辈多出生于宋亡之后，故除年龄较长之宇文公谅之父挺祖曾任宋职外^⑦，余皆不及仕宋。至于后期各科之举行已在宋亡之后70年至90年。进士祖父一辈大多出生于宋亡前后，但亦有5人曾仕于宋朝^⑧。曾祖仕宋者亦不过5人^⑨，而仕元者亦有1人^⑩。

前期各科及元统元年进士祖先出仕元朝者比率甚低，而出仕者之中又以任教职者占多数，此种现象一方面显示南人谋取一般官职之不易，另一方面亦可能反映遗民思想的影响。前期进士祖先出仕元朝一般官职者仅有延祐五年进士虞槃之父汲（？-1318）、至治元年进士刘铸之父有庆、泰定元年进士赵宜中之父某、至顺元年进士刘耕孙（1296-1355）之父恣及其同年进士林泉生（1299-1361）之父士霆。其中虞汲及刘有庆皆系由学职转入翰苑，有庆任待制^⑪，汲任编修^⑫，不过为正八品官。其他3人官位亦低。赵宜中之父某，“仕不择官”，当为杂职^⑬。刘恣及林士霆分别官武冈路经历及兴化路录事判官，都是正七品小官^⑭。前期进士祖先入元后任教官者共9人。其中任路、州学教授者有欧阳玄之父龙生（1251-1308）^⑮、雷机之父德润^⑯、岑士贵之父翔龙（1254-1317）^⑰及许晋孙（1288-1332）之父炎等四人^⑱。任书院山长者有千文傅之父雷龙^⑲及方道猷之父栋等2人^⑳。任学正者有刘彭寿之父纯^㉑及何槐孙之父天骏等2人^㉒。任县学教谕者则有孔涛之父纯^㉓及李质（1291-1337）之父继祖等2人^㉔。

元统元年进士祖先曾任元官职者仅徐祖德之祖梦奇及朱文霆（1295-1363）之祖治安。徐梦奇官职甚高，任从三品之宣慰副使^㉕。而朱治安则任河南等处医学提举，阶从六品^㉖。该科进士祖先任学职者则有李毅（1304-？）之祖省忠、父以明，除祖德之父泉孙及刘基之父熿等四人^㉗。

后期进士祖先担任教职之比率略少于前期及元统元年，仅有3人次，实际为2人，即孔暘之祖士璘任县学教谕，雷燧之祖及雷伯拽之曾祖德润任路教授^㉘，而后期进士祖先担任元朝一般官职者的比率较前有大幅度之增长，主要原因乃是七名进士父子接踵登科。由于佻亲已由科举入官，增加了“官职”栏之比率。此7名进士为至正二年科黄郛为至治元年科黄雷孙之子^㉙，至正五年科林彬祖，为至治元年科林定老（1276-？）之子^㉚，至正十四年科李贯道为至顺元年科李裕之子^㉛，至正二十三年科雷燧为延祐五年进士雷机之子^㉜，陈介为至正五年进士陈异之子^㉝，曾仰为至正十四年进士曾坚之子^㉞，而至正二十六年进士雷伯珽则为雷机之孙、雷燧之子^㉟。可见科举为江南书香门第增加不少仕进机会。后期进士祖先未曾登科而任一般官职不过9人。官职最高而声名最高者为至正二十年进士危於之父危素（1303-1372），官至岭北行省左丞，秩正二品^㊱。官职较高者有孔暘之父奘任松江府判官^㊲、至正八年科凌懋翁之父时中累官都水监丞^㊳、至正十四年科林

温（1317-?）之祖栢任台州路照磨^⑩。其他如至正五年科刘环翁之父某^⑪、林温之父邦福^⑫、至正十四年科陈麟（1312-1368）之父瑶及危於之曾祖龙友（1247-?）等人所在任皆为卑职小官^⑬。

从进士间显著的内亲繁殖现象亦可看出元朝江南进士几乎为宋朝以来若干士大夫家庭所垄断。除前述之父子接踵登科外，尚有叔侄或兄弟联翩登第者。叔侄先后成进士者有延祐二年之杨景行（1277-1347）与泰定元年之杨升云^⑭、延祐五年之黄常与至顺元年之黄昭^⑮及至正五年之吴从彦与至正八年之吴师尹（1303-1366）等6人^⑯。兄弟或从兄弟赓续登第者更多，有下列10人：延祐五年雷机与元统二年之雷杭（1302-?）^⑰、延祐五年科岑良卿、林冈孙与至治元年之岑士贵、林以顺^⑱，至治元年之王相（1296-1361）与元统元年之王充耘（1304-?）^⑲，元统元年之朱彬（1308-?）与至正二年之朱倬（?-1352）^⑳及至正十一年之方德至与至正二十六年之方景章等^㉑。合父子、叔侄、兄弟接踵登科者计之，达32人次，占现知南人进士总人数11.35%。其中建宁雷氏更有4人登第。此外，机之弟栢、次子灿皆为至正十年乡贡进士。雷机、雷杭之曾祖时子宋朝已为太学内舍生，祖父龙济亦中宋乡举。据宋濂说：“辄闻闽中雷氏兄弟以易经相传授，所为经之大义，流布四方，多取以为法。”^㉒可见雷氏世代以《易经》为家学。

与宋明两朝相比，元朝进士出身于布衣家庭的新血比率较小，但仍有相当数目，有如前述。这些“布衣”家庭的背景却甚为复杂，不尽相同，可分以下几类加以分析：

第一，地位低微：史料明言出身卑微的进士仅有至正十一年科严瑄及至正十四年科钱用壬。严瑄为隶卒子^㉓，而钱用壬之父职为“乡司”。所谓乡司即是“专与乡里大家理田亩丈尺赋税，……至贱之职也”^㉔。此类进士初无家财及家学可以凭藉，应是苦学而成材。

第二，家庭之身份可以确定，但背景不明：碑传中言及进士祖先时或以“潜德不耀”、“家居不仕”之类字句描述，或仅提及三代祖先名而未言及其仕历者，皆可肯定为布衣家庭。至治元年进士周尚之（1268-1328）^㉕、泰定元年进士姜天麟（1288-1329）及泰定四年进士著名诗人杨维桢之家庭皆属前者^㉖，而延祐二年科杨景行（1277-1347）、泰定四年科谢升孙（1296-1370）及至正二年科卢琦（?-1362）则属后者^㉗。此二类之家庭可能为乡里富户，可能为畝亩农家，亦可能为布衣书香。

第三，平民书香：此类家庭因祖先三代无人登第任官，遂在表二中列为“布衣”。但实际上不乏文人学者，显然为布衣书香之家。有的家庭以教学为业，如至顺元年进士黄昭之父奎“教授乡里”^㉘，至正十四年进士曾坚之祖正吉、父严卿（1276-1328）亦是“家居教授”^㉙。这些进士祖先虽未能取得教授、山长之类的学职却在乡里教授子弟，是当时所谓“乡先生”^㉚。有的进士祖先虽未能登科入仕，却以学术见之于记录，以致其子弟往往显名于科场或学界。如泰定元年进士冯翼翁（1292-1354）之父鲁（1258-1340），“博通群书，庭训甚严”，其长子奖翁亦两举于江西^㉛。又如泰定四年进士汪英之父应辰（1276-1344），“好读书，常手自编录为文，赋诗以平易古澹为主”。英从弟汪杰，亦与乡贡^㉜。更如至正二年进士朱倬之父庆龙为一处士，子其家奉祀乡贤吕南公。倬之从父朱礼为乡贡进士，著有《汉唐事笺》，从兄彬则为元统元年进士^㉝。情形类似者尚有延祐五

年科之谢端(1279-1340)^⑤、至治元年科之王相(1296-1361)^⑥、泰定四年科之黄清老(1290-1348)^⑦、至顺元年之刘闻^⑧、刘性(?-1344)^⑨、至正五年科之著名剧曲家高明(约1305-?)^⑩、至正八年之邹奕^⑪及至正二十三年俞元膺等人的家庭^⑫。此外,又有少数进士的个别祖先之学术事功现已不可得知,但文献却显示其家为“衣冠世族”、“诗礼名门”,吴从彦、吴师尹及至正十一年科之许汝霖皆属此类^⑬。南襟时代以“进士”为业的家庭数目甚大,但其子弟能够跃登龙门者不过九牛一毛。出身布衣之家的元代进士不少出于此类平民书香之家。至顺元年进士刘性便是一典型例证,据说“刘氏数世力学,至粹衷(即刘性)始有爵于朝”^⑭。这种数世力学然后始能登科的情形,不仅元朝如此,汉族王朝时代亦是如此。

第四,应为仕宦而无记录之家庭:祖先原曾登科或为仕宦而在载籍之中却无记录,表二中遂列为布衣。此类家庭应属不少。最明显之例证为元统元年南人进士出身于非仕宦家庭之10人中,余观(1308-?)、江文彬(1298-?)、朱彬(1308-?)及张本(1298-?)等四人皆出身于儒户,而按当初人籍之规定,儒户应为宋朝官宦及科第之家^⑮。

第五,旁系祖先具有仕进背景:直系祖先虽乏仕宦纪录而旁系确曾仕宦,此种背景亦有助于士人之读书求仕。此类资料收集不易,古未列入统计。现知有二例:杨升云之伯祖某官翰林待制,升云早年因而受知大臣郝天挺(1247-1313),获授瑞州路学正^⑯。至正五年进士周瞰为集贤待制周应极之族侄,因得应极之推荐而入国子学,对其以后登第入仕必有甚大帮助^⑰。

以上五类平民“家庭”中,除第一类确属卑微,第二类身份不明外,其他三类皆为广义的士大夫家庭。而第三、第四两类更是南宋士大夫阶层的延续。

六、元朝科第之家在明朝的延续

元明鼎革,一如蒙元统一江南,统治民族虽经改变,社会结构却无重大更革。鼎革之意义仅为民族革命,而非社会革命^⑱。唯一主要改变为汉族士大夫取代元朝之蒙古、色目世家而成为统治阶层的核心。因而,不少宋元的科第世家在明朝得以重振,成为新兴绅士阶层的一部份。

元朝科第之家在明朝的延续,可自下列两方面来考察:

第一,进士本人于元亡之后改仕明朝:

关于元明之际进士政治动向,过去学者受乾嘉史学大师赵翼的影响甚大。赵氏认为元朝进士大多“仗节死义”,为元殉国^⑲。赵氏所举殉国进士16人中,南人仅为4人(周鏞、聂炳、刘耕孙及彭庭坚),在南人进士中仅占少数。

事实上,元明之际进士之动向,甚为复杂。反元群雄之下,皆有元进士及乡贡进士效力。而朱元璋延用元朝科第之士颇早,得其助力甚大。元璋于至正十五年(1355)渡江前后,即已网罗不少士人为其筹谋画策,包括元乡贡进士李习、陶安(1315-1371)、朱升(1299-1390)等。3年后进军浙东,更赢得以元统元年进士刘基为首的浙江东士大

夫效力。刘基、宋濂等人从此成为元璋之主要谋臣文胆，对其政策颇有影响^④。明朝建立后，元璋更屡次征用元室故官，网罗胜国人才为己用。

元朝南人进士出仕明朝者，现已考知 19 人。其中刘基于至正二十年（1260）入朱元璋幕，降明最早，对明朝建国贡献最大^⑤。其同年张兑仕明为翰林编修^⑥。其他各科仕明者尚有：泰定四年科张以宁（1301—1370），官至翰林侍讲学士^⑦。至正八年科之孔克表^⑧、乡奕皆任翰林修撰^⑨。至正十一年科之朱梦炎官至礼部尚书，钱幸任国子博士、寻适累官广西按察使，刘承直、鲁渊（1319—1377）分别任浙江道及江西道按察司金事^⑩，程国儒则任洪都府知事，而何淑为太子宾客^⑪。至正十四年科之钱用壬仕至礼部尚书^⑫、赵淑任翰林待制^⑬、林温（1317—？）为秦王府赞善^⑭。至正二十年科之危於受命为安庆儒学教授^⑮。至正二十三年之雷燧任翰林编修^⑯，徐宏则为府学教授^⑰。除上述十八年外，至正二十三年科之陈信之登洪武四年（1317）首科，先后为两朝进士。其同年林文寿亦中洪武三年（1370）福建乡试^⑱。总之，元季进士人仕明朝者比率甚大，现知人数远多于元殉国之进士。明朝为一幅兴南方之汉族政权，江南士大夫纷纷投效，并非意外。

第二、元进士后裔在明朝登科或任官：

明朝建立后，即恢复科举，改革制度，扩大名额。明朝平均每科录取进士 250 余人，虽少于南宋，却为元朝实际录取之三倍半，不可谓不多^⑲。而且明朝取消元朝蒙古、色目保障名额，登第进士几乎全为汉族人士。而在汉族士人间之竞争中，南方举子由于学术水准较高，占有甚大优势。明初各科进士大多为南方人士所攫取。即在洪熙元年（1425）设置区域定额制以后，南卷录取之数仍多于北卷及中卷。通明一代，福建、浙江、江西分占全国各省录取进士多寡之第一、二、四名，可见南士在科举中之优势^⑳。此一情势有利于元朝南人进士后裔在场屋中扬眉。

欲研究元明两朝科第家族间之关系，因牵涉浩瀚之明代史料，一时殊难穷进。现拟从下列三方而略加论述：

第一、洪武四年（1371）进士不乏出身于元朝科第之家：《洪武四年登科录》为明初三十年仅存之进士登科录，可惜该录记述进士家世不多。但自有限之记录仍可看出该科进士与元朝乃至宋朝科第之家间的关系^㉑。此科状元吴伯宗即出于宋元科举世家抚州金谿吴氏。伯宗为至正十六年乡贡进士吴仪（1307—1371）之子，至正十一年进士吴裕从第^㉒。二甲进士陈信之、赵旅、吴公达亦与元朝科第具有关联。陈信之原为至正二十三年进士，信之之父陈英观亦为元乡贡进士。赵旅出于宋朝宗室，为泰定四年进士赵宜浩之侄^㉓。而吴公达则为元乡贡进士吴世德之子。

第二、明朝前期、中期名臣中不乏出身于元朝进士之家者。杨士奇（1365—1444）及李东阳（1447—1516）可以为例。杨士奇为延祐首科进士杨景行之四世孙^㉔，建文（1399—1402）朝试吏部第一，官至少师，李东阳则为元统元年进士李祁四世族孙，天顺八年（1464）登进士第，官至吏部尚书^㉕。杨、李 2 人皆为以文章领导晋绅的宰臣。此外，洪武后期任翰林学士之刘三吾（原名如孙）曾登至正七年湖广乡试副榜。其兄为至顺元年进士刘耕孙，可见三吾与元朝科第亦有密切关系^㉖。

第三、元朝若干科第较盛之家族在明朝仍然科第仕宦不衰。兹以建宁雷氏、莆田林